



那年那月 那群远征的人

岁月如梭，逝者如斯。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艰苦卓绝而又无比辉煌的长征，至今已过去了整整80年。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”这首绝大多数国人都熟悉的名句，一直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斗向前。80年来，长征这一英雄史诗始终是教育和激励人们奋斗前进的生动教材，是人民军队军魂的生动体现。长征离80年后的今天是如此遥远，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回顾长征，同前辈们做跨时空的思想沟通，把伟大的长征精神永远继承下来。

中央为何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

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，两支部队拥有10余万众，为打破国民党军的“围剿”，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。

6月26日，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决定“集中主力向北进攻”“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”。8月3日，红军总部颁布《夏洮战役计划》，决定兵分两路经草地北上，左路由朱德、张国焘指挥，右路由徐向前、陈昌浩指挥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。8月底右路军走出茫茫大草地，胜利到达班佑、巴西地区，等待左路军靠拢，共同北上。但是，9月10日凌晨，中共中央突然率红一方面军第1、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。

为什么中共中央要在与左路军会合之前，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呢？

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，顽固坚持南下

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举手同意北上，但后来却出尔反尔，一再企图南下，准备在地瘠民贫的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，建立根据地，想避开国民党中央军，偏安一隅。

为此，他百般拖延部队北上行动，致使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。在红军总部颁布《夏洮战役计划》，决定兵分两路北上之后，他仍几次三番想带部队南下。

后来，中共中央和前敌指挥部联名致电左路军领导人，规劝张国焘“立下决心，改道北进”，并历陈南下的诸多弊端。张国焘对中央再三劝告置若罔闻，顽固坚持“乘势南打”的错误主张，并命令所属立即部署南下。

张国焘大肆向党要权，不服从中央指挥

在已经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情况下，张国焘倚仗枪多人多，以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，继续肆无忌惮地向中央要权，甚至借陈昌浩之口提出让自己担任军委主席，还要求大批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。

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，中央满足了张国焘部分要求，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，部分红四方面军干部增补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。但张国焘还不满足，继续拖延北上。

9月初，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，才不得不继续前进。但当左路军先头部队进至岷曲河时，张国焘又借口河水上涨，停止了前进，并电告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，公开反对北上，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。

在此情况下，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和刘伯承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。朱德亲自到河边观察，并派警卫员下河探测水深，发现队伍完全可以涉水通过，据此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。但张国焘不仅继续按兵不动，还煽动个别

人员对朱老总施压。

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冲突

张国焘为实现南下目标，对中央决定置若罔闻，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。

早在两军会师后的7月，张国焘就在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，提出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。9月8日，他电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，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，如其不服从，则将其扣留。

9月9日，张国焘电令，要求右路军“南下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”。叶剑英看到电报后，立刻报告毛泽东。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博古等经紧急磋商，为贯彻北上方针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，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第1、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，脱离险境，先行北上。

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，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和随其行动的红一方面军第5军和第32军南下，于10月5日，在卓木碉另立中央，自封为“主席”，并通过其“中央”的组织决议，公然宣布“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博古、洛甫（张闻天）应撤销工作，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，并下令通缉”。

对于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的决策，1937年3月23日至31日，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毛泽东指出：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，他按兵不动，中央尽力迁就他，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。但一到毛儿盖，就反了，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，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，这是完全不对的，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。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，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。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，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，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。因为这电报上说：“南下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。”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，那么会打起来的。

总而言之，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，是在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、以武力胁迫中央的情况下发生的，是党中央的被迫之举。

历史证明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正确的。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，一是避免了红军间可能的武装冲突，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力量，维护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建军原则；二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并最终落脚陕北，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，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；三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先行北上的成功实践，使广大红军官兵，在事实面前，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和分裂党、红军图谋的本质，为实现全军的集中统一指挥，创造了根本条件。

是谁把重病的周恩来抬出草地

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历程。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，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，保持着严明的纪律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，同甘共苦，团结互助，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，终于走出草地。萧华在《长征组歌》中写道：“风雨浸衣骨更硬，野菜充饥志越坚。官兵一致同甘苦，革命理想高于天。”这是红军将士以超人的意志力量战胜茫茫草地的真实写照。

过草地时，红军官兵为援救同志宁可牺牲自己的感人事迹不胜枚举。其中，红军将士抬着重病的周恩来过草地的故事就更为感人。那么，具体是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的呢？

长征中，周恩来工作特别忙碌。杨尚昆曾回忆说：“长征中的恩来同志，也和在中 央苏区一样，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。他每到驻地，就叫人架起电线，接收各军团的电报。同时，挂起地图，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、作战的路线。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。等情况来齐后，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，就起草作战命令、下达行军路线，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，他才睡觉。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，但眼睛不好，晚上工作不方便，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，而由自己承担起来。”由于长期劳累，特别是睡眠不足，周恩来身体非常疲乏，有时骑在马上也会睡着，容易摔下马来。为防不测，他常常步行，以驱除睡意。

到达川西毛儿盖后，周恩来因疲劳过度、营养不足，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，身体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，连续高烧40摄氏度不退，多日昏迷不醒，不能进食。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——疟疾来治。经检查，发现他肝部肿大，确诊是肝炎，已变成肝脓疡，急需排脓。但在当时环境下无法消毒，根本没条件做穿刺或开刀手术，只能采取保守疗法。由于缺医少药，战士找来冰块敷在他的肝部，用局部冷冻的方法降低体温，控制炎症发展，引导向下排脓。终于，周恩来排出了脓，高烧也渐渐消退，身体慢慢好起来。

离开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，周恩来的病

情已渐渐好转，但由于连续高烧、五六天没吃东西，身体极度虚弱，不要说过草地，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十分困难。

毛泽东非常着急，一再嘱咐彭德怀：“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，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”

彭德怀当即组织担架队抬周恩来过草地。担架队是从运送迫击炮的战士中抽调的。彭德怀下了死命令：“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，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，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。”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，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见人手不够，也主动加入担架队。

同志们抬着周恩来，向着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发。茫茫草地，一望无际，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，根本没有路。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，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。抬着担架在草地上行军极端困难，脚底下要时时留意一个个泥潭，稍不小心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。

草地天气变化无常，时而狂风四起、大雨滂沱，时而漫天飞雪、冰雹骤降。经过长途跋涉，红军战士缺少衣食，冻饿交加，体质都非常虚弱。周恩来不忍心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、步履艰难地抬着自己，多次要挣扎着爬下担架自己走，又一次次被战友们按倒在担架上。就这样，大家顶风冒雨，深一脚、浅一脚，抬了6天6夜，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茫茫草地。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是生死攸关时刻的扶持，是真诚无私的帮助，让周恩来终生难以忘怀。

1954年，杨立三病逝。周恩来在追悼会上回忆起过草地时的情景时泣不成声，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。他不顾大家的劝阻，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。周恩来说，当初是立三把自己从草地中抬出来的，现在要送他这一程。

1961年，陈赓在上海病逝，周恩来亲笔题写了“陈赓同志之骨灰”，让邓颖超送给陈赓夫人傅涯，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，表达了周恩来与陈赓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。

晚综

